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进路

李小平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进路

李小平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进路/李小平著.—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623-5392-8

I. ①马… II. ①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3224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进路

李小平 著

出版人:卢家明

出版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17号楼,邮编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scutcl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020-87113487 87111048(传真)

责任编辑:李欣 吴俊卿

印刷者:广州市天河穗源印刷厂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0.75 字数:202千

版次: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先进知识分子西学之进路	(12)
一、西学“器”：师夷长技以制夷	(13)
1. “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西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14)
2.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要内容及其体现的文化观	(15)
3. “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西学活动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影响	(17)
二、西学“制”：宪政和民主共和	(18)
1. 晚清时期中国学习西方宪政等民主思想的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18)
2. 西学先制和民主共和等活动及其思想对当时中国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21)
三、西学价值观：新文化运动	(24)
1. 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缘由	(24)
2. 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价值功能	(27)
第二章 20 世纪初中国文化论争及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影响	(31)
一、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论争的背景	(32)
1. 中国西学技术、宪政等活动遭受挫折和失败	(32)
2. 欧战后中国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再认识	(32)
二、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论争的主要内容	(34)
1. “中学”与“西学”的论争	(34)
2. “问题与主义”之争	(36)
3. 科学与玄学之争	(40)
4. 从文化论争战走向政治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43)
三、20 世纪初中国文化论争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影响	(46)
第三章 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	(49)
一、中国人民为何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文化分析	(49)

1.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观	(49)
2.自由主义思想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52)
3.自由主义难以挽救当时中国外无独立、内无民主的混乱局面	(54)
二、中国人民为何没有选择三民主义的文化分析	(55)
1.三民主义的政治文化观	(55)
2.三民主义在政治文化观上的作用	(57)
3.中国人民为何没有选择三民主义的文化原因	(58)
三、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	(61)
1.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62)
2.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先进的文化	(64)
3.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	(65)
4.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能满足中国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利益	(68)
5.近代中国人民形成的民主自由精神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选择	(69)
四、李大钊与陈独秀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原因	(71)
1.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原因	(71)
2.陈独秀从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原因	(76)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分析	(79)
一、从“以俄为师”到“认清中国国情”的文化观念转变	(79)
1.“以俄为师”提出的原因	(79)
2.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早期的贡献	(80)
3.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错误指导及其消极影响	(82)
4.从“苏化”到“认清中国国情”的转变	(84)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基础	(89)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实践基础	(89)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渊源	(90)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哲学论证	(9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及其文化分析	(101)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	(101)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文化分析	(106)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认同	(109)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认同	
.....	(109)
1.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	(110)
2.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认同的贡献	(111)
.....	
二、延安整风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认同	(126)
1.延安整风运动的文化背景	(127)
2.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	(129)
3.延安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获得文化认同的贡献	(133)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的提出和宣传,进一步强化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	(137)
1.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由来和主要内容	(137)
2.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观念	(139)
.....	
四、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召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认同	(140)
第六章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进路的启示	(144)
一、文化自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文化动力	(144)
1.“文化自觉”内涵的一种新理解	(144)
2.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自觉的过程	(145)
.....	
3.以文化自觉的态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48)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展动力来源于多种文化矛盾的交织	(149)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展是由多种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	(149)
2.要正确处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促进中国当代	
马克思主义发展	(153)
结语	(155)
一、实事求是	(155)
二、解放思想	(156)
参考文献	(158)
一、参考文献与论著	(158)
二、参考期刊论文	(159)

绪 论

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进路研究（1848—1949）”这个课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文化史方面还比较欠缺，而文化力量在当今全球范围内都受到重视，中国共产党也在近期提出文化在影响国家实力方面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本来将研究的时间点定为1840—1949年，因为1840年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但是直至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所以选择1848年开始研究比较合适，而因为篇幅原因，本书只能考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1949年。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比较热门，其作为专业学位博士点在很多高校设置以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为深入，成果也日益丰硕。但是总体来说，从实践需要和实践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发展规律和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的成果特别多，从文化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偏少。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必要突破这种单一的研究视角，从文化角度来加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文化的含义非常宽泛，在《辞海》中有以下几种解释：“从广义上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①本书中所讲的文化是指狭义概念中的精神产品本身及其发展变化过程。

本文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文化来考察其产生、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因为20世纪前后，世界各地希望用一种先进的革命文化来指导革命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该时期

^①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972.

变得非常流行。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革命文化一开始是作为一种文化观念被介绍到中国，后逐渐被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由于中国革命的迫切性与具有科学性、革命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等使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慢慢流行起来，并在部分革命队伍中迅速得以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来到中国后应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国国情结合，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最终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革命要继续发展，就要不断以新的理论来指导，不断在革命理论上创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架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将自己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集中代表就是毛泽东思想。其实毛泽东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此文化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更有时代化的内容，这三者是相互融合的。从历史长河中看，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毛泽东思想就是一种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一被提起，人们往往把它等同于一种意识形态。诚然，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确实具有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但是其毕竟是 20 世纪初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现象。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纯粹从文化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现象和过程，对于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凸显中国文化“软实力”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沿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及其启示、中共主要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等问题，并取得了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如：何一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曾德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汪青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李敬煊的《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安启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何继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赵明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等著作，以及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数千篇文章。近年来，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探讨的主要观点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赵明义等人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首次提出来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段话中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原本是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由于斯大林不赞同这个提法，所以在将该文收录《毛泽东选集》时将其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只要认真研究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详细阐释之后，就会理解“中国化”即是“彻头彻尾”地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东西”之真实含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相互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很多有才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新的见解。汪青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层含义，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化。”边立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带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同时“带着”中国国情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价值诉求；同时，又让马克思主义实现质的飞跃即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何继龄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运用和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认识，其价值要在实践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历史演绎。许全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有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没有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谈不上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支持。今天我们大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由于学术的需要，更是为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支持。

历史沿革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形成和阶段区分等问题。学者陆剑

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阶段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而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理论飞跃。第二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形成阶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探。第三阶段，就是从1978年开始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围绕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来展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围绕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来展开的，科学发展观是围绕怎么更好地发展的主题来展开的。而学者曾德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时代，第二阶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革初期，第三阶段为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步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划分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形成阶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阶段。按照他的观点，第一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革命文化传入中国，在中国化争论过程中逐步获得了较高的重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其用行动带动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日益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大革命的失败等原因，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推进革命发展的同时，又用革命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就形成了第二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形成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优秀革命志士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也不断思考马克思主义如何真正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经过对井冈山斗争、遵义会议、以延安为大本营的抗日战争等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果，其主要体现在1940年前后毛泽东同志的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发表。第三个阶段，是1945年的中共七大后至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成熟。

以史为鉴，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为今天服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研究为当今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镜鉴”作用。何一成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与科学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出真知的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根本原则。石仲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做了这样的概括：带着马克思主义深入熟悉中国国情；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形成民族化；放眼世界，把其他国家优秀文化揉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中；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形成更强大的物质力量；对错误要及时总结，对经验要加以提炼，推动理论不断发展。何继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恰当而符合国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永远是党前进的力量，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党内矛盾要恰当处理，既要民主，也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本质的联系，具有稳定性及很强的指导意义。学者宋一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他从哲学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做了阐述。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普遍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标是指向共产主义，所以需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其“中国行”是题中之意；“中国化”是矛盾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必然要求的表现。当然这个“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其他的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非特指，而“中国化”是具有独特的指向。同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体现了实践与认识的统一，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实践中产生而后又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上也根本没有这样的理论。所以，必须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获得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依此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才能推动革命实践的有效进行。学者王信砚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即经验就是规律，规律就是经验。他认为，通过观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会发现，如果哪个时期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能取得好成绩；如果哪个时期坚持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受挫。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江传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交织与融合的过程。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民族的形式；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资源，具体包括实事求是、小康理想、重民、重德以及与时俱进等思想。周英展认为，传统文化精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积极推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取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认同。中国的“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相吻合；古

代“经世致用”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相结合产生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相通；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的内在契合；优良民族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文化支撑作用。王国炎指出，在宽广的文化视野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绝不仅仅是从理论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在经济、政治、思想、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内实现现代化，从而彻底而实际地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旧面貌，实现文化的跨越式整体转型，在扬弃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现代文化。何一成认为，传统文化精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和互补中使民族精神得到了弘扬和培育，但同时，传统文化糟粕，比如小农经济的传统影响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起到了消极作用。何萍、李维武则侧重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交织与碰撞上，分析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过程，并且从中国 20 世纪的思想变化中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对本书颇有启发的观点，并提供了资料的线索。王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集中体现在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解。传统文化中的小农文化心态、政治本位主义、宗法等级观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不良影响。此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拓展，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除以上论述的内容外，国外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非常多和深入，其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不足的方面。其优点在于他们能从客观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新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大有裨益。但由于受到资料、价值观及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很多不恰当、不充分的论证和评价，所以我们要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无论如何，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佐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只有成功的实践才往往会拓展理论界的研究范围和深度。

总结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做得比较好的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越来越统一和准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梳理得很清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概括得很到位。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是：从哲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缺乏深度；很少从新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如以

现象学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文化史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存在不足之处，尽管有学者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基于这方面的认识，本书试图从一种文化何以发生的范式思考，追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观念是何以产生、发展的。

康德曾经指出：“一切知识都需要有一个概念，虽然那个概念在事实上可能十分不完全或者十分模糊，但是就其形式来说，一个概念总是用作一条规则的某种普遍性的东西。”^①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理论派别的立场和侧重点不同、历史时间跨度等，有时候相同的概念会有巨大的差异性，而不同的概念也可能有相同的所指对象。因此，对本书中的“文化”“进路”“文化进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和诠释则显得非常有必要。

如何界定“文化”？这是一件非常有争议且有难度的事情。有人统计，文化的含义有一百多种甚至两百多种。众说纷纭的文化定义，恰恰说明了文化包含了深刻的内容和巨大的外延。尽管没有公认的、权威的科学定义，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结果；广义的文化是指人化，即人独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把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中。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文”与“化”两个字的复合。“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周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象两纹交互也。”在这个基础上，后人把“文”引申出几个含义：一是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之意引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意；三是引申为美、善、德行之意，使之具有了审美、伦理的维度，以及通过各种改变使之更加完善的意思。关于“化”一字，最早记载的是《礼记·中庸》：“可以参天地之化育。”《说文解字》载：“化，教行也。”《荀子·不苟》载：“神则能化矣。”总之，在古代中国，“化”有改易、生成、造化、化育等含义。

最早把“文”与“化”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是《易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自然规律，而“人文”指社会生活中人伦秩序和规章制度等。同时，这里把“人文”“天文”与“化天下”结合起来的意思是：治理国家等人类活动必须参照自然规律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8.

的变化，治理社会秩序也要把握人伦道德、社会风俗等，以达到社会秩序良好、天下太平的状态，使人们的思想从野蛮走向文明。到了汉代，就出现了把“文”和“化”合并使用的词语。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此后，《补亡·由仪》载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在西方语言中，与“文化”对应的词语最接近的是拉丁文“cultura”，本义为“耕耘、栽培、种植”的人，指与人们有目的地劳动相关的事物，或由人们劳动而活动的事物，而后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

根据《辞海》所载，“进”一词的含义非常多：一是前进、向前之意，如《列子·汤问》：“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二是进入之意，与“出”相对。三是送上、呈上之意，如《礼记·曲礼上》：“伺饮于长者，酒进则起。”四是推进和引进的意思，如《国语·晋语九》：“猷能而进贤。”五通“赉”，即收入的钱财。如《史记·高祖本纪》：“萧何为主吏，主进。”六通“尽”，即消失、竭尽的意思，如《列子·黄帝》：“竭聪明，进智力。”“路”一词也有多重含义：一有道路之意，如《离骚》：“回朕以复路兮，及行迷之为远。”二有途径、门路之意，如《楚辞·九章》：“固烦言不可结而兮，愿陈志而无路。”此句中的路有生路之意。三有纹理、道理之意，如《尚书·洪范》：“无有作恶，遵王之路。”四有条理之意，如笔路。五有路程之意，如《朱子语类》：“虽行二三里，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进”和“路”都是常见词，使用也频繁，所以其意思也非常多，在这里不一而足。

把“进”和“路”两字合起来使用的时间也比较早，其意思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上路出发之意，如《楚辞·九章·怀沙》：“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宋书·谢晦传》：“太祖时已戒严，诸军相次进路。”《敦煌变文集·董永变文》：“二人辞了便进路，更行十里到永庄。”第二，有前进的道路之意，如《司马法·用众》：“凡近敌都，必有进路。”清朝王有光《吴下谚联》一文指出：“度其进路，规其出路，察听其家动静。”第三，指事物发展演化的途径，如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进路”一词在学术中使用得比较少，一般用得比较多的是“路径”。本书使用“进路”一词有感于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的：“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梁启超是提出“文化进路”概念

的第一人。“文化进路”即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尽管由于环境变化之大,人类文化发展的演进方向趋向一致,最终使得某种文化观念不断强大,并不断影响民众和给社会改造以巨大的力量。文化演进的路径是一个“合力”的过程,文化深受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的差异,会使得人们的文化观念差异性非常大,但是一个国家、社会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社会团体,由于集团利益的共同性,会使得文化观念走向一个大体的方向,如民主共和思想成为清朝末期人们共同的心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其出现和发展也是一个进路的过程,在中国政治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产生于不同社会阶级但是由于共同的社会理想,不断用革命行动让“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不断发酵并得到强化,“汹涌澎湃”地在中国大地上发展,最终推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者

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存在较大分歧:

第一,李大钊说。由于李大钊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因此,理论界对其理论文本的研究下了极大功夫,并在其著作中找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如程明欣、原村认为李大钊曾经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产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合乎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①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倡者是李大钊”。^②

第二,瞿秋白说。瞿秋白在1923年初担任《新青年》主编时曾提出以“研究中国的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办刊宗旨,以“求得解决社会的问题”,“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③据此,学者谢建芬认为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人。

第三,毛泽东说。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来

①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

②程明欣,原村.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J].河北学刊,1996(2).

③瞿秋白.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5.

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①

当然还有人认为是张闻天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人。这些分歧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就开始酝酿，只是比较谁的提法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而已。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理解上有很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结合说”。杨奎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并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而诞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②理解这个含义时要注意的是谁适合谁的问题。杨奎松认为，是由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而不是由中国国情适合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要主动适合中国国情，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二，内容说。如张静如、鲁振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要基于中国国情，二要有中国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三要有实质性的独特内容。^③众多学者普遍认为，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不仅要形式上，更要在内容上中国化，为中国“量身打造”，才能使其让中国民众真正熟悉起来并真正成为革命的重大理论武器，才能抓住人民群众这个现实的物质力量去改造中国。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即需要赋予它中国风格和特点，使其成为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实质说。如卢培琪、王立胜认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准确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完全忠实于中国国情，把准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充分把握的中国国情相结合，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和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化与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的过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

②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

③张静如，鲁振详.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N].人民日报，1995-7-25.

程中，不断提炼创新马克思主义新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①

除了以上观点外，还有很多关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出现的这些不同意见，恰恰推动了关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理解的进程，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内容的丰富性。

本书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重点是把它理解为一个文化观念在中国的演进过程。

^①卢培琪.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EB/OL].人民网, 2003-12-24.